

学人文库

岑参事迹著作考

廖立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K 825.6 =42/5

● 学人文库

岑参事迹著作考



廖立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学人文库

岑参事迹著作考

廖立著

责任编辑 张燕萍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625 印张 209 千字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200 册

ISBN7-5348-1542-8/I·644 定价:11.00 元

目 录

唐代户籍制与岑参籍贯·····	(1)
岑参生年再辨·····	(12)
岑参兄弟考	
——兼及其若干家事·····	(22)
南溪别业与少室居止考·····	(28)
高适征诣长安岑参献书西周在洛阳辨·····	(37)
岑参赴西域时间路途考补·····	(47)
岑参出游考·····	(57)
岑参诗友考·····	(66)
吐鲁番出土文书与岑参·····	(87)
岑诗编年考补·····	(97)
岑集版本源流及各本之评价·····	(118)
敦煌残卷岑诗辨·····	(132)
岑诗篇目异录考证·····	(142)
岑集的校勘·····	(161)
岑诗的注释·····	(179)
唐玄宗朝西域战争性质与岑参边塞诗·····	(200)
岑诗中阴山等地名问题·····	(212)
岑诗西征对象及出师地点再探·····	(224)
岑诗边塞地名考	
——(包括《走马川考》)·····	(232)
岑诗河南地名考·····	(246)
岑参边塞诗的风格特色·····	(259)

唐代户籍制与岑参籍贯

研究岑参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是何地人。这位诗人的籍贯问题，至今还存在疑问。

唐杜确《岑嘉州诗序》、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元马端临《文献通考》、辛文房《唐才子传》等都说，岑参，南阳人。这据岑氏先祖汉征南大将军岑彭为南阳棘阳人，后世乃以郡望定属。岑参祖辈不居南阳棘阳已数百年，说是南阳人，只是唐人好称郡望的习惯。湖北江陵旧志，《大清一统志》则说，岑参，江陵人。自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也主江陵说后，国内风从，似成定论。岑氏的入江陵，自岑善方始，善方孙文本自江陵归唐，累官至中书令，当为岑参是江陵人的根据。但自文本以后，岑参的祖及父均不居江陵，岑参更一生未涉江陵一步，说是江陵人，与实际并不相符。若以曾祖文本起家江陵而定岑参为江陵人，则又落入以郡望定属的老例。要弄清这一问题，还得从唐代户籍制的具体情况入手，才能找出近似实际的答案来。

古代游宦世家，籍贯都不大好定。东晋偏安之后，士人皆仍著籍于中原，子孙相承。这在当时，已经有人指出其不当之处。东晋孝武帝时，范宁曾陈述时政说：“昔中原丧乱，流离江左，庶有旋返之期，故许其夹注本郡。自尔渐久，人安其业，邱垅坟柏皆已成行，虽无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实。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断人户，明考课之科，修闾伍之法。”但这件事历经南朝各代，似乎始终没有彻底解决。自哀帝时即下制“天下所在土断”，经孝武帝时范宁上疏，安

帝义熙九年刘裕又上表“依界土断”，到南齐更设校籍官，但户口版籍一直比较混乱。究其原因，一是由于门阀观念作怪。东晋南迁，贵族流寓江南，子孙皆可依门第而授高官，这就要保留原来籍贯。正如梁武帝时尚书令沈约上言所说：“晋咸和初苏峻作乱，版籍焚烧。此后起咸和三年以至于宋，并皆详实。……此籍精详，实宜保惜，位高官卑，皆可依按。”这个详实，却是一个与实际不符的东西。如谢灵运，祖辈居江南已经数代，还是“陈郡阳夏人”。就查门第、考出身、定官位来说，可能是足供“依按”的，但就其“安土之实”来说，恐怕是不足为凭了。二是作伪者多。因为籍贯的名与实可以不符，居山阴祖孙数代者可说是陈郡阳夏人，加以士庶有别，贵族的后代可免徭役赋税，这样就有人出钱买假籍贯了。于是“以新换故，不过用一万许钱，昨日卑微，今日仕伍”（沈约语），这样就连原籍江南的人也改籍江北了。三是由于天灾人祸，流徙迁移，江南人也会改入他郡。陈文帝天嘉初曾经下诏：“自顷丧乱，编户播迁，言念余黎，良可哀愴，其亡乡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内随其适乐，来岁不问侨旧，悉令著籍，同土断之例。”对老百姓因有赋税徭役的问题，可以强行著籍编户，而对官宦世家就难办了。著籍也没赋税，不著籍也没徭役，“陈郡阳夏人”依然故我，直到陈亡这件事也没彻底解决。

隋朝统一南北，版籍赋税之法仍承袭前代，贵族、官宦及其所属人户享有特权，“称郡望”这种风气仍延续下来。据《隋书食货志》载，“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这些王公贵人及其下属，当然籍贯都不在长安、洛阳，但实际长居都下。还有一种“浮浪人”，虽居某州县，但也不在编户之内，其课、役也与编户不同。那些世代游宦的人，因官寓居，籍贯也不好定。

唐承隋制，仍有六朝遗习，官宦世家也喜以门第自高，往往仍

称郡望，并不著籍所居之地。只要看一下《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就可知这种弊病。上行下效，士族无不攀附贵胄，遂使许多人籍贯与居住处不符。但到底唐代与六朝不同，不少人也著籍于他郡。如韩愈《唐故检校尚书左仆射右龙武军统军刘公墓志铭》所载：“公讳昌裔，字光後，本彭城人，曾大父讳承庆，朔州刺史。大父巨敖，好读老子庄周书，为太原晋阳令。再世宦北方，乐其土俗，遂著籍太原之阳曲。曰：自我为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这位刘公颇有一点革新精神，“所在土断”，不作空有其名的彭城人。晋末刘裕就曾讲过：“在汉西京大迁田、景之族以实关中，即以三辅为乡闾，不复系之于齐、楚。”唐人移居入籍的例子也不少。如王维，《旧唐书文苑下》说：“王维字摩诘，太原祁人。父处廉，终汾州司马，徙家于蒲，遂为河东人。”又：“杜甫字子美，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当然这只是一情况，即“著籍”于所居的州县，改籍为阳曲人、河东人、巩人。但如果并未“著籍”呢？那当然仍为空有其名的彭城人、祁人、襄阳人。至于虽已改籍而仍称旧郡者，那就是好称郡望的老毛病，与实际籍贯就不相干了。唐人中有的还比较实事求是，如毕彦雄《大唐龙兴大德香积寺主净业法师灵塔铭并序》云：“法师讳象，字净业，赵姓。族著天水，代家南阳，冠冕相辉，才名继美，因官徙属，今为京兆人也。”赵象祖籍天水，中世家于南阳，到唐实为京兆人，毕彦雄这种叙述方法就很完备而合乎实际。

岑氏祖籍南阳棘阳，自流徙江南后，世代游宦，历经许多代，也换过许多地方，但似乎一直并未“著籍”他郡。岑彭的五世孙岑晊徙居吴郡。又经七世，岑柯为吴鄱阳太守，徙居盐官。又经十世，岑善方于梁末“更家江陵”。依照六朝惯例，恐怕均未“著籍”。唐张景毓《大唐朝散大夫行润州句容县令岑公德政碑》说：“十三代孙善方，随梁宣帝西上，因官投迹，寓居于荆州焉。”“寓居”也就是侨居，并非户口版籍改隶荆州，否则“德政碑”的主人就不能说“君名

植，字德茂，南阳棘阳人”了。岑善方为萧督襄阳郡守，魏恭帝元年（公元554）十月，宇文泰发兵五万攻萧绎，十一月克江陵，立萧督为梁主，这时岑善方才到了江陵，官太府卿，后迁吏部尚书，卒于萧督七年（560）。居官江陵七年的人，也不大可能“著籍”江陵。善方卒时有七个儿子，史书也有记载的三人：之元、之利、之象。《周书岑善方传》说：“之元，太子舍人，早卒。高祖录善方充使之功，追之利、之象入朝，授之利帅都督代王记室参军。……之象掌士中士、隋文帝相府参军事。”周高祖宇文邕即位于公元560年，即善方死之同一年，因此，追之象等入朝的时间，当在善方死后不久，这时岑善方居江陵也不到十年，儿子就到长安做官去了，因此也不会“著籍”江陵。

闻一多以岑参为江陵人，就是从岑之象的儿子岑文本说起的。新、旧《唐书》都说岑文本是南阳棘阳人。闻氏所据乃《法苑珠林》卷七十《富贵篇》中的一段记载：“唐中书令岑文本，江陵人，少信佛，常念诵《法华经普门品》。曾乘船于吴江中，船坏，人尽死。文本没在水中，间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也，如是三言之。既而随波涌出已著北岸，遂免死。后于江陵设斋，僧徒集其家，有一客僧独后去，谓文本曰：天下方乱，君幸不预其灾，终逢太平，致富贵也。言毕趋出，送出外不见。既而文本食斋，于食碗中得舍利二枚。后果如其言。文本自向临说。”岑文本的幼年经历，《唐书》只举为父雪冤一端，其他不甚了了。岑之象历仕周、隋，前后约四十年，都在北方。岑文本十四岁时，父之象为人所讼，不得申，文本诣司隶理冤。文本卒于唐太宗十九年（645），年五十一岁，当生于隋文帝开皇十五年（595），十四岁为炀帝大业四年（608），其时父为邯郸令，文本也在北方。文本生于何地，可以推知。之象入隋后历尚书虞部员外郎、邵陵、上宜、渭南、邯郸四县令。上宜县，开皇十七年置，在今乾县西北，之象必于其时为令。邵陵，在今河南鄆城境，大业

初废人，之象当于开皇十七年前为邵陵令。故文本当生于邵陵。其后当随父居上宜、渭南、邯郸，都在北方。岑之象于邯郸令后不再居官，大概回居江陵。《旧唐书岑文本传》说：“其父冤雪，由是知名。其后郡举秀才，以时乱不应。”时乱，当在大业末年。“郡”，当为江陵。岑氏在江陵可能稍有产业，或为萧督所赐，或为自置。《感旧赋》所谓“阍土宇于荆门”，就是指的这个旧业。既有产业，就有户口版籍的问题，为官者虽可免课役，而户籍总要编入某郡某县。但隋也有“浮户”、“浮人”，虽居其地，并未入籍。所以究竟如何，也难定论。《新唐书岑文本传》文本有“汉南一布衣”的话，可知其入唐后，曾以汉南人自称，但“布衣”也不合实际。唐高祖武德元年，萧督曾孙萧铣拥兵自立，迁都江陵，引文本为中书侍郎。这个官并不小，为什么还说是“布衣”呢？因为这是改朝换代的时候，萧铣是亡国之君，文本岂能以此作为政治上的荣耀，所以要避讳了。秦东陵侯召平入汉即为布衣，连生活也难维持，靠种瓜自给，当然也不敢再摆他的侯爵身份。所以岑文本不仅要自称布衣，而且也不能拿岑彭这位先祖来夸耀自己，不敢称郡望为南阳人了。武德四年文本二十七岁，随萧铣降唐，这时他在江陵住了十三年。此后，文本随李孝恭平辅公祏，到了扬州。贞观元年，又到长安，“除秘书郎，兼直中书省”，从此以后他都在长安做官，一直到贞观十九年卒于征辽途中，也再没回江陵过。值此换代之际，岑文本究竟籍隶何地，也是难以考实的。

岑文本很受李世民的赏识，不断提拔他，官做到宰相。所以他把“家”也搬到长安了。《新唐书岑文本传》说：“既任职久，赏赐丰饶，皆令弟文昭主之。文昭任校书郎，多交轻薄，帝不悦，谓文本曰：卿弟多过，朕将出之。文本曰：臣少孤，母所钟念者弟也，不欲离左右。今若外出，母必忧，无此弟，是无老母也。泣下呜咽。帝愍其意，召文昭让敕，卒无过。”此可见文本不仅把弟弟带到长安，

并且把母亲也搬到长安了。岑文叔死得较早，史书称“长倩少孤，为文本鞠爱”，“少为文本所鞠，同于己子”，可知连侄子长倩也带到长安了。可以说，岑文本这时已“更家长安”，或者说，“因官投迹，寓居长安焉”。

岑文本虽家于长安，江陵旧业恐怕还有遗留，因为岑善方、岑之象是死在江陵的，应有坟墓在。岑长倩后来被诬谋反而诛时，曾发掘父祖坟墓。长倩父文叔早卒，大约也葬在江陵。长倩随叔父到长安，但他母亲可能留在江陵，所以入唐以后，江陵岑之象一房旧业大约归文叔一房照管。之象兄弟七人，其他人也应有后代留居江陵者。至于之象一房，武后时长倩遭诛，家被籍没，江陵旧业就荡然无存了。这只要看岑参在父卒后，“早岁孤贫”，居晋州，居嵩阳，并未还江陵。在蜀中罢官东归时，曾念终南别业，陆浑别业，也不及江陵，可知江陵其时已经没有旧业了。江陵是岑参东归必经之地，若有旧业，他只字不提是不可能的。

唐代户籍，自武德六年三月令每岁一造帐，三年一造籍，其后相沿不变。对于客居之户，则编次于旧户之后，差科则量减。但官宦之家，例有特权。《通典》卷七载，“按开元二十五年户令云，诸户主皆以家长为之。户内有课口者为课户，无课口者为不课户。诸视流内九品以上官及男年二十以上、老男、废疾、妻妾、部曲、客女、奴婢皆为不课户。”岑文本移家长安后不营产业，又是高官显宦，其户口版籍如何编附，难知其详，但既然要计户口，岑家自应入册，虽为不课户，版籍也应有名。揆度事理，恐应为京兆“客户”。唐有永业田，六品以下听取本乡公田充，五品以上则在京都附近各县。永业田与职田不同，虽解免者也追回，而子孙袭爵者则得继承永业。唐宰相皆封公，据《感旧赋》，岑文本为江陵公，岑长倩为邓国公，岑羲为汝南公（史书谓南阳郡公）。《通典》卷二载，开元二十五年令：“其永业田亲王百顷，职事官正一品六十顷，郡王及职事官从一品

各五十顷，国公若职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顷。”岑文本江陵公之爵应由长子曼倩承袭，其永业田不在江陵当无疑问。子孙得承永业，版籍也必有改移，虽有原籍，也另有新籍，这就使文本之后子孙籍隶何地大成疑问。

岑文本的子孙，据现有资料，也没人再回江陵。文本长子曼倩官终雍州长史（《元和姓纂》谓刺史，当是亲王领州，并不理政事，长史总揽州务，等于刺史），在长安。次子景倩先在长安，后在武则天朝做官，麟台少监，是京官，在洛阳；卫州刺史，在今河南汲县；宏文馆学士，京官，在洛阳。景倩四个儿子，其长子岑植是岑参的父亲，再看岑植的经历。据《岑公德政碑》，岑植“弱冠以簪缨贵胄，调补修文生。明经擢第，……解褐同州参军事，……特授蒲州司户参军。俄以亲累，左授夔州云安县丞。……秩满，丁府君忧去职。”修文生及擢第在长安，同州即今陕西大荔，蒲州即今山西永济，云安即今四川云阳。其父死在洛阳，服丧不在洛阳就在醴泉（从葬于岑文本）。服丧期满，调补衢州司仓参军事，地即今浙江衢县。后又“授润州句容县令”，地即今江苏句容。由句容又擢授一官，但失载为何职，似已去长安。开元初，又做过仙州刺史，地即今河南叶县。又迁晋州刺史，地即今山西临汾，卒于任所。岑植一生宦游各地，从未至江陵，其“著籍”江陵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张景毓是景龙初句容县佐，是岑植的下属，碑文称岑植为“南阳棘阳人”，应该知道岑植并未“著籍江陵”。如果像闻一多所说岑文本“籍隶江陵”，这位唐太宗中书令的赫赫高官的孙子，岂能不追祖父余烈，成为“荆州江陵人”？汉光武帝的征南大将军岑彭，并不比唐太宗的中书令（宰相）岑文本官高、位尊，如果岑文本确已“籍隶江陵”，他的孙子何必舍近求远，追攀岑彭的余荫？这倒恰恰说明，岑文本虽起家江陵，随萧铣降唐，但他并未“著籍”江陵，所以他的子孙也只好“著籍”于渺茫的南阳棘阳了。这虽与实际不符，但像岑氏这样流

徙江南十余代居无定所的宦游者，“户口簿”本来是不大好填写的。闻氏又说《新唐书》载岑羲为江陵人，则为误记，《新唐书》并无此类记载。

岑氏虽流徙各地，但自岑文本起，墓葬所在是知道的。岑文本死后，“陪葬昭陵”。昭陵在今陕西醴泉县，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功臣葬昭陵，功臣子孙若与光荣的祖先分葬他地，这不合中国人的传统，所以唐太宗又允许陪陵者子孙“从葬”。《新唐书太宗纪》贞观二十年八月，“丁亥，许陪陵者子孙从葬”。由此可知，岑文本的坟墓在昭陵，他子孙的坟墓也在附近。现存岑诗中，有一首《唐博陵郡安喜县令岑府君墓铭》，有这样的句子：“泾水汤汤，汉陵苍苍。”这足证是葬于渭北的。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岑植下有三弟，其二弟名梈，官终安喜县令，就是这位岑府君了。安喜即今河北定县，岑梈死后，千里迢迢从安喜把棺材运到醴泉来下葬，这就是“从葬”，也是追乃祖的余烈。岑梈既如此，那么，他的父亲岑景倩虽然死在洛阳，当然也要“从葬”于昭陵附近的。岑梈的大哥岑植死在晋州，当然也要“从葬”于昭陵附近的。就是岑参本人，虽然死在蜀中，但坟墓也不会在成都，而应在醴泉县。自岑文本起，到岑参为止，一百余年，可以说岑氏在长安也是“邱垅坟柏皆已成行”。如果没有岑长倩、岑羲两遭诛戮，子孙又宦游各地，长安很可能已成了岑氏的“家乡”。援赵象之例，可说是“族著南阳，曾家江陵，因官徙属，今为京兆人也。”陪陵者子孙从葬，指的是直系。岑文叔、岑文昭是兄弟，岑长倩是侄子，都不在“从葬”之列，他们葬于何处，不得而知。

岑参本人从出生起，可以说一生同江陵都没关系。岑参大约生于仙州，六岁至晋州，十四岁从晋州迁王屋，十五隐于嵩阳，并居少室多年。约开元二十六年入居长安，及第并授官，居约十年。天宝八载入安西，十载还京，十三载入北庭，至德二载还京，在西域五

年多，居京又五年多。乾元二年出为虢州长史，居三年。宝应元年为关西节度判官，转为雍王适掌书奏，在潼关、陕州、洛阳转战一年。广德元年入京为尚书郎，居三年。大历元年入蜀，居成都、嘉州四年。大历四年底卒于成都。岑氏素无产业，岑参为官后，也是以官养家。从岑诗中可知，他有一个弟弟是跟随他的。岑诗少叙及家事，但他的妻子儿女当然是靠他供养的。他的生母卒于何年，也不得而知，但只要活着，也应是跟随他的。这样，岑参为官后，也应是移家长安。但岑参生于开元盛世，版籍不修，贯属何地，更难确定。《新唐书杨炎传》：“自开元承平久，不为版籍，法度抗敝。”《旧唐书杨炎传》也说开元中“不为版籍之书”。再加上岑参因官投迹，流徙各处，究竟“户口”何在，自然连“档案”也没有。

不过，岑参当时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籍”，方能进士及第。《封氏闻见记》卷三《制科》：“旧举人应及第，开检无籍者不得与第。陈章甫制策登科，吏部榜放，章甫上书：时见榜云，户部报无籍。记者，昔傅说无姓，殷后置于盐梅之地；屠羊易名，楚王延以三族之位，未闻征籍也。范雎改姓易名为张禄先生，秦用之以霸。张良为韩报仇，变姓名而游下邳，汉祖用之为相。则知籍者所以计租赋耳。……所司不能夺，特咨执政收之，天下称美焉。”陈章甫无籍，可见唐时有无籍的人。其得登第，乃由特许，按常规是不得与第的。岑参是进士科，与制科不同，但他也应该有一个“籍”，才能列于州县为乡贡，最后“进士高第”。但这个“籍”，当然不能是江陵。而最有可能的是两个地方，一为南阳，一为颍阳。南阳是祖籍，但当时允许这样作，因为岑参可说是“浮人”，本来就没有真正的户籍，只有说是南阳。颍阳是岑参的家，他的母亲、妻子住在颍阳。家居颍阳，不管是“浮户”也罢，“客户”也罢，三年一造籍，一律附于旧户之后。李峤证圣元年说“逃人”，“听于所在录名，即编为户”；宝应二年九月下敕说的“客户”，“若住经一年以上，自贴买得田地，

有农桑者，无问于庄荫家住，及自造屋舍，勒一切编附为百姓”；杨炎于建中元年上疏说的“户无土、客，以现居为簿”：这是唐代的户籍法规。岑诗中屡见颍阳之名，这不是一般的颍水之阳，而应为颍阳县，详细论证另见专文。岑参居颍阳而出入京洛十年间，有一首《戏题关门》诗：“来亦一布衣，去亦一布衣。羞见关城吏，还从旧道归。”这是经过潼关时所写。唐代经过关津，是要呈验“过所”的，相当于今天的身份证或护照。《唐会要》卷八十六《关市》：“宝应元年九月敕，骆谷、金牛、子午等路，往来行客所将随身器仗等，今日以后，除郎官御史、诸州部统进奉事官，任将器仗随身，自余私客等，皆须过所上具所将器仗色目，然后放过。如过所上不具所将器仗色目数者，一切于守捉处勒留。”过所由所属州县颁发，岑参自应由洛州颍阳县颁发。如本县无籍，不在编户，过所也就不发给了。流民偷越关卡，自有他们自己的窍门，但岑参过潼关是经过“关吏”验放的，自应有“过所”随身。这也使岑参必须有一个“籍”才行。这个籍当然只能是颍阳。

颍阳是岑参及第授官前的家乡，因而他很恋旧。岑诗中涉及嵩颍家乡的诗有二十来首。如《浣水东店送唐子归嵩阳》：“归梦秋能作，乡书醉懒题。”又如《送郑甚归东京汜水别业》：“客舍见秋草，忽闻思旧山。看君灞陵去，匹马成皋还。对酒风与雪，向家河复关。因悲宦游子，终岁无时闲。”这两首诗都作于长安，岑参以长安为“客舍”，自己是“宦游子”，而嵩颍是“旧山”，是“乡”、“家”。一直到他客居蜀中，还对嵩山念念不忘。如《峨眉东脚临江听猿怀二室旧庐》：“久别二室间，图他五斗米，哀猿不可听，北客欲流涕。”在他罢官泛舟东归时，只字未提江陵，而是欲归陆浑。如《巴南舟中思陆浑别业》：“浣水南州远，巴山北客稀。……梦魂知忆处，无夜不先归。”诗称“先归”，题为“陆浑别业”，当然是归陆浑。陆浑为唐县名，其东北鸣皋山有岑氏别业，鸣皋山是嵩山馀阜。

岑诗中也有实指长安为“家”、“乡”、“故园”的，数量也不少，这都是授官移家长安以后所作。如《逢入京使》：“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送韦侍御先归京》：“客泪题书落，乡愁对酒宽。”《安西馆中思长安》：“家在日出处，朝来喜东风。”这都是在西域时所作。大概赴西域乃只身独往，母亲、妻子都留长安，所以思家心情很重。岑参移家长安后，户口版籍也可能有所改变，虽为客居京城，大约也要编附于旧户之后，是“客户”。因为是九品以上官，当然是“不课户”，设有赋税徭役。对地方官来说，这种户没油水可捞，当然怎样编附，也都无关紧要。

岑文本是否江陵人，今日也难定论。即使岑文本由江陵归唐，或者也算是“籍隶江陵”，但他到长安做了高官，移家长安，并有封爵，长子曼倩“袭公”，版籍当有改变。长情之难，江陵旧业及父祖坟墓荡然，后代更难以“籍隶江陵”。岑参一支更三代不居江陵，稍有旧业，也都在长安、洛阳近县，与江陵已毫无关系。《感旧赋》：“树桑梓于棘阳，辟土宇于荆门。”桑梓为故乡，土宇为寓居，意义甚明。棘阳为县名，虽唐世已无，但汉世确有。荆门乃泛指，不是说江陵县。岑参进士高第时开检籍贯绝不能是江陵，如非以郡望定属为南阳棘阳，也当为现居家所在的颍阳。这一问题本属细枝末节，但历史的本来面目，总还应该据实考察的。

《中州学刊》1986年4期

岑参生年再辨

——兼及各说的论证方法

岑参生年最早由赖义辉《岑参年谱》定为开元六年(1930年《岭南学报》第一卷第一期)。不久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又定为开元三年(1933年作,收入《闻一多全集》第三卷)。刘开扬《略论岑参的诗》则定为开元四年(1957年作,收入《唐诗论文集》)。曹济平《岑参生年的推测》则以为在开元二年(1957年《光明日报》)。孙映逵《岑参生年考辨》又以为在开元五年(1981年第三期《南京师院学报》)。拙作《岑参生平数事略考》(载《文学论丛》第六集)对此问题有所论述,推崇闻一多说。但五十年来众说纷纭,自难一旦趋于一致。今再草此文,分辨各说之得失,以供讨论。为明是非,须有所肯定否定,本意决不在对各学者本人有何抑扬。

二年、四年、六年各说方法上的共通点,就是只从一个证据着手立论,不顾其他,因而陷入矛盾。

赖义辉的根据是岑参的《行军诗》:“吾窃悲此生,四十幸未老。”诗题下原注:“时扈从在凤翔。”唐肃宗至德二载二月至凤翔,十月收复长安即还京,故诗作于此年,即公元757年。赖氏由此年上推三十九年,为开元六年(718)。以此为基点,“二十献书阙下”在开元二十五年,天宝三载二十七岁进士及第,三十岁“初授官”在天宝六载,并赴安西,十载还京,至德元载三十九岁任北庭度支副使,至德二载至凤翔行在官右补阙。赖氏只看重至德二载的《行军》诗有“四十幸未老”句,却忽视《北庭作》诗有“可知年四十,犹自

未封侯”句。依赖氏之说,《北庭作》诗写于至德元载(此点也未必确实),则应为三十九岁,也有不合。此说更大的矛盾还在《轮台歌》:“亚相勤王甘苦辛,誓将报主静边尘。”汉代宰相有缺,以御史大夫递补,唐人因称御史大夫为亚相。封常清于天宝十三载三月返京,始摄御史大夫、权北庭都护,充伊西北庭节度使,十四载冬召回京守东都,因兵败,十二月被唐玄宗斩于潼关。依赖氏之说,此送封大夫西征的《轮台歌》竟作于封常清死后一年。另外,此说与岑参他诗讲年代处也有不合。《太乙石鳖崖口潭旧庐招王学士》诗:“偶逐干禄徒,十年皆小官。”依赖氏之说,初授官在天宝六载,九年后为天宝十五载,其时岑参已赴北庭,并不在石鳖谷。而且其年安禄山占据长安,为官者也不能居石鳖谷。即使推迟到至德二载,岑参只能于冬日还京,与诗言“骤雨鸣淅沥”之夏秋景也不合。可知仅据一证,不顾其他,自将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

刘开扬认为,闻一多的开元三年说与《秋夕读书幽兴献兵部李侍郎》诗有矛盾。诗作于广德元年,自开元三年至此为四十九年,诗中有“年纪蹉跎四十强”,四十九岁不能说四十强,因此应生于开元四年。生于四年则小一岁,此说以一岁之差解强字,很难圆满,四十八怎么比四十九强多少呢?特别是生于开元四年与岑诗也有不少矛盾。如《感旧赋》作于天宝二年,《初授官题高冠草堂》作于天宝三载,刘开扬也是同意的,但生于开元四年,作赋时二十八岁,作诗时二十九岁,与自言“参年三十”“三十始一命”都不合。赋中自言“二十献书阙下”,依刘说,献书在开元二十三年。然自献书至作赋时首尾九年,又与赋中“蹉跎十秋”不合。赋中的“五岁读书,九岁属文,十五隐于嵩阳,二十献书阙下”,所言岁数都应为实数,而“参年三十,未及一命”、“蹉跎十秋”却是虚数,也很难解释。又《冬宵家会钱李郎司兵赴同州》诗有“寒天高堂夜,扑地飞雪时”、“季女犹自小,老夫未令归”等句。诗作于长安,时间为冬日。岑参